

宗喀巴大师家世新探

马 林

摘 要: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宗喀巴大师的家世放在吐蕃、宋、元、明时期湟水流域各部族的聚合、衍化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同时依据有限的藏汉文史料和一些口碑资料,对有关宗喀巴大师家世的“华锐玛姓家族说”和“宗喀十三族之祁家族说”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认为根据历史大线索,宗喀巴大师的祖上为“宗喀十三族之祁家族”的可能性最大。同时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元代以后,其家族已归入了“宗喀十三族”或纳入了“宗喀十三族”活动的地域,明代以后又进一步纳入到“塔尔寺五族”的范围内了。

关键词: 宗喀巴 家世 历史文献

中图分类号: C958.12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338(2016)04-0013-06

作者简介: 马林,男,青海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藏学。

关于宗喀巴大师的家世及其父母的情况,各类史料记载得极为简略,而且不乏相互龃龉之处。由于史料的缺乏,历来的研究者们也没有过多地着眼于这一问题的探讨。

在藏族历史上,由于受印度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影响,特别是种姓制的影响,人们特别是地位显赫的达官贵人、高僧大德们,非常注重出身门第和血统,讲究种姓的高贵和血统的纯正。人们相信“河水是冰雪融化的,人种是天神繁衍的”。许多出身低微的著名人物,凡提及出身门第的,其本人或后代总要千方百计地把他的家世同西藏历史上某一高贵而纯正的种姓、某一著名的姓氏、某一古老而显赫的家族甚至印度的王族联系起来,哪怕这种联系是牵强附会的。这种现象在藏文史料中可谓司空见惯。如出身于西藏山南琼结家族、被称为“伟大的五世”的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他在写《自传》时,尽管声称并不愿与那些以出身贵族而夸耀、显摆之辈为伍,但还是在著述中用了大量篇幅来记述家族的传承,把自己的家世同印度的萨霍尔王族联系起来,给琼结家族罩上了一个高贵的光环。可是,对于被誉为释迦牟尼事业的接班人、“第二佛陀”的宗喀巴大师这样一位声名显赫人物的家世与出生,本应大书特书,但几乎所有的宗教典籍中都用“种姓圆满”一笔带过。现代著述者也只好以“大师的家族种姓非常圆满,自大师降诞以来,上至父族,乃至母族,好几代行止都无弊端”^{[1]16}之类的语言敷衍而过,语焉不详。一些史料也仅提到宗喀巴大师的家族为“卫藏十八大姓”之一的“玛氏”,但对其家族的传承,未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因此,我们也无法顺这条线索去考证。

一、关于宗喀巴大师的家世

作者在撰写《宗喀巴大师传》的过程中,一篇题为《宗喀巴落发皈依的峡峻寺》的文章引起了作者的注意,似乎看到了揭开宗喀巴家世之谜的一线曙光。文章对宗喀巴大师出生家世提出了与传统记载完全不同的说法“宗喀巴祖上原住喔隆布老,即红泉儿,座落于峡峻之北,约七公里处。相传吐谷

浑被吐蕃征服后,一部迁居于此,后来称呼该村为吐人庄。吐人风俗习惯与今之土族人民相似,但已信仰佛教,操藏语。宗喀巴之母放牧于附近的阿尔吉,后来迁徙曲卡放牧,不论放牧于何处,她是峡峻地区的牧户,受峡峻的管辖和保护。宗喀巴与喔隆布老、当彩、业隆等祁家族姓同属一族源。”^[2]这里所说的峡峻寺也译夏宗寺,在今青海省平安县祁家川的寺台乡(该乡2006年8月并入三合镇)。而祁家族聚居的主要村落有今平安县沙沟回族乡的牙扎、党欠(大寨子),古城回族乡的山城、中庄、沙卡(北村)、且尔甫、角加、排楼沟,三合镇的帮业隆、李仓麻(新安)、高羌、冰岭山(将志)和石灰窑回族乡的周它(石挂寺)、宜麻、石灰尧等村落。据考证祁家措哇昂索驻地高羌昂索湾,已被列为平安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另按照文章的说法,宗喀巴的祖上原来驻牧在夏宗寺附近的喔隆布老,即今平安县石灰窑回族乡的黎明村一带,附近的老百姓至今仍把该村称为“土人庄”。其家族也应当属于“宗喀十三族”中的祁家族。文章还提到该家族是被吐蕃征服后迁居于这一带的吐谷浑人后裔。

由于目前没有其它史料可以佐证这种观点,我们很难从其说,但从历史的大背景来看,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公元7世纪末吐蕃占领吐谷浑后,虽然吐谷浑王室和一部分属民迁离了青海,但大多数部众仍留居故地,“附落犹存”,成为吐蕃的属民。这一时期吐蕃在其占领区推行了强有力的统治,语言的统一、藏文的推行和军队驻屯、移民,特别是随着吐蕃对青海各族人民的融合、同化政策的施行,加快了吐谷浑融合到藏族中的进程。9世纪中叶吐蕃崩溃后,吐谷浑人仍居住在湟水和大通河流域,“依险屯聚自保”,但其融入藏族的进程并没有停止。“故唐以后,青海地区已几无诸羌及吐谷浑人的踪迹可寻,而包括河湟地区在内的整个河陇地区大量汉族也在吐蕃强制同化下吐蕃化了。”^[3]如果说宗喀巴的先祖确实出自“宗喀十三族”中的祁家族,祁家族的先祖确实是吐谷浑人,那么很有可能在这一时期已经被同化为藏族了。

那么,我们能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寻觅到这一家族的踪影呢?有研究者认为,所谓“祁家族”,实际上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乔家族”,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音变。^[4]确实,从历史记载来看,乔家族与祁家族在宋代以后活动的地域是相一致的。据《兰州府志》记载“河州西南有乔家族。”^[5]《宋史》记载得更为确切“循化城……南至下乔家族地分一百余里。”^[6]按照距离推算,乔家族活动的地域正好在平安县祁家川一带,也就是“宗喀十三族”中的祁家族的所在地。如果此说成立,那么至少在宋代以前,祁家族已经成为祁家川一带的藏族豪门了。

到了唃廝囉政权时代,这一家族又同唃廝囉王族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势力更加强大。唃廝囉自摆脱依附李立遵、温逋奇等人的局面,在青唐城建立了独立的政权,确立了青唐主的地位后,在内外施政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巩固和发展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权。其中利用对外战争的机会,提高在吐蕃各部落中的威望,招降、征服不愿降服的部落,就是巩固新生政权、扩大统治区域的力举,这其中也包括“政治联姻”这一历史上百试不爽的手段。唃廝囉的原配夫人是李立遵的女儿,自脱离李立遵之后,他又将政治联姻的目光对准了“所部六、七万人”的祁家川一带势力强大的豪门乔家族。在招降乔家族首领结什角并与之结盟后,又娶乔氏家族之女为第三房妻子。唃廝囉对乔氏百般宠爱,宋廷也非常重视这一联姻,1039年(宋宝元二年)四月,封唃廝囉之妻乔氏为“永嘉郡夫人”。同时,因李立遵死后其在宗哥地区的势力大大削弱,原配李氏也逐渐失宠,后李氏被唃廝囉贬斥为尼姑,安置在廓州(今青海省化隆县)。唃廝囉有3子,长子瞎毡、次子磨毡角为李氏所生,第三子董毡为乔氏所生。爱屋及乌,董毡也甚得唃廝囉的宠爱,9岁时唃廝囉就奏报宋廷,将董毡任命为会州刺史,让他年纪轻轻就参与政事,随他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唃廝囉死后,董毡继立青唐王,“独有河北(指黄河)之地”,被宋朝于1068年(宋熙宁元年)封为“太保,进太傅”。母以子贵,乔氏也因此被封为“安康郡太君”,舅舅乔家族也因此更为显赫。该家族在元代以后逐步演化“宗喀十三族”中的祁家族了。

另外,关于宗喀巴出身的家族,还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认为其家族为华锐藏族。他们主要依据《松巴政教史》中关于宗喀巴“生于华锐玛姓家族”的记载,辅以宗喀巴大师的著作中有许多古老的华锐方言词汇的例证,说这些都是宗喀巴是华锐人的有力证据。

“华锐”,藏语意为“英雄之地”或“英雄部落”。历史上华锐是指湟水以北、河西走廊以东,包括

青海的乐都北山、互助、门源、大通东部和甘肃的天祝、肃南皇城等藏区。历史上把这一地区的藏族习惯上称为“华锐藏族”。一般认为华锐藏族的主体是吐蕃人,相传吐蕃王朝时期王朝本土的一支军队进驻华锐地区,后因战乱、政权更替等原因留居在当地,繁衍生息,逐渐形成了该地区藏族的主体。清代华锐地区著名学者松巴·益西班觉在《青海史》中也认为最早进入青海的吐蕃本土藏族人就是这部分华锐人。有人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后认为,虽然藏族华锐方言还是属于安多方言区,但由于吐蕃后裔的背景和对传统文化的较好保存,所以形成了独特的藏语华锐方言,与安多其他地区的方言有着一定的差异。华锐方言保存了大量古藏语的词汇,有些用词发音也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安多语发音法。

以上关于宗喀巴家族来源的两种说法各执一词,目前还没有可靠的史料来支持其中的某一种说法,不过不管是“祁家族”就是“乔家族”且为宗喀巴出身的家族之说,还是“华锐藏族”之说,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元代以后,其家族已归入了“宗喀十三族”或纳入了“宗喀十三族”活动的地域,明代以后又进一步纳入到“塔尔寺五族”的范围内了。史料记载说当时宗喀巴的家庭“亲里眷属,时足千人。七族之中,人亦甚众”,可见该家族也是人丁兴旺、族系庞大。

二、关于宗喀巴大师的父母

对于“第二佛陀”宗喀巴的生身父母,佛教典籍、历史文献有不少记载,民间也有许多传说。根据史料记载,宗喀巴的父亲名叫鲁本格(klu abum dge),母亲叫香萨阿曲。宗喀巴的父亲鲁本格,有的史料在其名字前面加上“达鲁花赤(Da re kha che)”的称谓,即达鲁花赤·鲁本格,这显然是一种头衔。对“达鲁花赤”一词,历来有不同的解释。《藏汉大辞典》把这个词解释为蒙古语借词,意为“权大势大”。有人认为这是个蒙古语和藏语的复合词,“Da re kha”为蒙古语“darqan”的藏语译音,汉语一般译作“答剌罕”或“达尔罕”,蒙古语原意为“被豁免赋役”的“自由民”^[7];而“che”是藏语“大”的意思。唐代以后,“答剌罕”一词逐渐演变成为突厥、蒙古两族长期沿用的官号。唐代突厥称“达干(dar-qan)”,是“专统兵马事”的武职官号,东、西突厥和回鹘都使用,不过到高昌回鹘时代,这个官号成为世袭的空衔。1206年蒙古立国后,成吉思汗对于共同创业的功臣,授以万户、千户等有实职的官号,而对成吉思汗家族“有恩”的功臣,则另加封为答剌罕。据《元朝秘史》和《世界征服者史》等书记载,元代答剌罕享受的特权主要有“宴饮乐节如宗王仪”(饮酒时准许“喝盏”);允许宿卫佩带箭筒;围猎时猎获的野物归自己独有;出征时抢掠的财物归自己独有;九罪弗罚;免除赋税;勿须获得许诺,随时可入宫禁;自由选择牧地等。蒙古答剌罕封号也是世袭的。元朝中叶常用答剌罕这一称号赏赉功臣,性质已与元初大异。

对“Da re kha che”一词更为普遍的解释是蒙古语“darqacin”的藏语译音,汉文译作“达鲁花赤”,蒙语原意为“镇守者”,相当于突厥语的巴思哈“basqaq”。这是蒙古和元代的官名,为所在地方、军队和官衙的最大监治长官。蒙古贵族征服许多其他民族和国家,无力单独进行统治,便委付当地统治阶级人物治理,派出达鲁花赤监临,位于当地官员之上,掌握最后裁定的权力,以保障蒙古大汗和贵族的统治。早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就设有这一官职。入元以后,路、府、州、县和录事司等各级地方政府,都设置达鲁花赤,虽然品秩与路总管、府州县令尹相同,但实权大于这些官员。设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长官司,也设达鲁花赤。兼管军民的安抚司,大都设有此职。元代达鲁花赤品秩最高曾达正二品(大都、上都达鲁花赤,后降为正三品)。品秩最低的是路府治所的录事司达鲁花赤,正八品。在重要的地方和军队还设有副达鲁花赤。1265年(元至元二年),元廷正式规定,各路达鲁花赤由蒙古人充任,总管由汉人、同知由回回人充当。之后,汉人作达鲁花赤的,便解除官职。在缺少蒙古人时,允许由“有根脚”(门第高贵)的色目人充任。

从鲁本格生活的元末的职官制度和青海地区行政建制来看,“达鲁花赤”的解释似乎更符合历史的真实。如上所说,“答剌罕”这个官号到元代中叶后已演变成为世袭的空衔,元廷常用这一称号赏赉功臣。答剌罕虽然是个虚职,但却享有许多贵族王公才能有的特权,而且还是世袭的,所以当时这一称号很少授予蒙古族以外的其他民族,至少在当时的甘青地区鲜有享有这一称号的异族官员。所

以我们认为授予鲁本格或其先祖答刺罕头衔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将“Da re kha che”解释为“大答刺罕”似乎有些牵强。不过也有人认为从“宗喀巴父亲在他三岁时他过继给法王顿珠仁钦并接受后者大量礼物来看,宗喀巴父亲的这一举动与一个高级地方官的身份颇不相称,若是说他是个‘被豁免赋役’的‘自由民’,似乎更合乎逻辑”^[8]。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种说法。元朝统一全国后的1264年(元至元元年),忽必烈在政府中设置总制院(后改名为宣政院),管理藏族地区的行政事务,在当时的吐蕃全境推行了统一的地方行政建制。在宣政院之下,将藏族地区划分为三个部分,建立了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简称宣慰司),分别进行管理,这三个宣慰司是: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简称吐蕃宣慰司)、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和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宣慰司之下,又分置了元帅府、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万户府、千户所等;邻近内地的藏、汉各族杂居地区,则置路、府、州、县。其中“宗喀十三族”或“塔尔寺五族”活动的安多宗喀地区都在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管辖范围之内。这三个宣慰司的各级官员从宣慰使到万户,都由宣政院或帝师荐举,皇帝任命。其中有的是朝廷派遣,有的则任用当地僧、俗上层人物为之。万户、千户等地方官一般都由僧、俗首领充任,准予按本地习惯传袭,并得自署其下属官吏。另外如上文所说,元廷同时在各路、府、州、县和录事司等各级地方政府设置了达鲁花赤,任命了一批除汉族之外的“有根脚”的藏族、土族、撒拉族等民族担任各级达鲁花赤。如在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之下的积石州、贵德州、礼店文州元帅府都设有达鲁花赤一职,撒拉族先祖尕勒莽的孙子神宝(韩宝)曾被任命为积石州达鲁花赤;土族赵土司家族自赵国宝招吐蕃有功,授三品印,任为蒙古汉军元帅,兼文州吐蕃万户府达鲁花赤以来,至其孙赵朵儿只,祖孙三代世袭文州吐蕃万户府达鲁花赤。由此看来,如果鲁本格的祖上确实是当地的望族,抑或像前面所说出自“宗喀十三族”中的祁家族,且有一定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那么被任命为较低品秩的达鲁花赤是完全可能的,这个头衔在鲁本格的父亲、祖父或更早一些的先祖头上应该是有实权的、实实在在的职位,但世袭到鲁本格这里,可能已经演变为虚衔设置仅仅是一个名分了。因此我们说将“Da re kha che”解释为“达鲁花赤”更为合理。

从史料记述的鲁本格和香萨阿曲的家庭情况来看,他们家似乎比较富裕,《至尊宗喀巴大师传》中说鲁本格虔诚信佛,“对贫穷诸人极为慈爱,布施信财,极其丰富”^[9],这就需要极其丰裕的家境做后盾。

不过在一些民间传说中,宗喀巴出生的家庭似乎并不富裕。有位名叫古伯察(Régis - Evariste Huc, 1813 - 1860年)的法国入华遣使会传教士,他曾于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至1846年(清道光二十六年)在内蒙古、青海、西藏、四川等地传教、旅行。回国后撰写了一部游记,叫《鞑靼西藏旅行记》。在这部游记中,古伯察详尽地记录了沿途各地、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山川风貌、社会经济、驿站里程及个人体验。古伯察于1844年年底进入青海境内,1846年初前往西藏,在青海逗留了整整一年,期间他曾在西宁、湟源县、塔尔寺、东科尔寺长期居住,与青海各族、各阶层的人有过广泛有时甚至是深入的接触,加上他本人具有非凡的观察力和理解力,因此书中所记载的大量有关青海各地、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山川风貌、社会经济等基本上都是真实可信的。不过他在塔尔寺居留期间,听到的这样一段有关宗喀巴父母的传说却有些离奇,让人匪夷所思:“垅堡-墨卡(指鲁本格)与其妻钦扎错(指香萨阿曲)共同过着游牧生活。他们没有大群的牲畜,只有20多只山羊和几头牦牛,这就是他们的全部财富。他们在数年间独自生活在这片偏僻的未开发之地,没有子嗣。垅堡-墨卡把他们的牲畜赶到了附近牧场,而钦扎错则孤独地住在帐篷中,忙于作奶制食品和根据安多妇女的习惯而用牦牛的长毛织纺一种粗糙的毛布。”^[10]按照这个传说,鲁本格的家族不过是一个普通甚至有些贫穷的牧民,怎么有足够的财力来广施钱财、周济穷人呢?当然,这仅仅是外国人记述的中国的民间传说,我们姑且妄听之。况且他所记述的宗喀巴父母的姓名也与史料记载的不符,不知“垅堡-墨卡”和“钦扎错”的称呼出自哪里?

有关宗喀巴父母的身世和家庭,与上边一则传说相照应的,还有许多在今湟中县共和镇和鲁沙尔

镇一带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

据生活在湟中一带的老人们传说,在宗喀巴出生的那个年代,如今湟中县的鲁沙尔镇、上新庄镇、汉东乡、大才乡、共和镇以至湟源日月山下,山上是茂密的森林,山下是丰盛的水草,居住在此地的牧民们都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宗喀巴的母亲就是现今共和镇苏尔吉村的人。当时苏尔吉村是“塔尔寺六族”中一个部落的帐房地。苏尔吉一带是她家的“夏窝子”,而现今塔尔寺周围是“冬窝子”。宗喀巴的父亲鲁本格是格萨尔王手下的一员大将,后来到苏尔吉村与香萨阿曲相识并成亲,成了苏尔吉的招女婿。香萨阿曲曾以该村苏家头人为义父,故该村苏姓家族自认为是大师的“娘家人”。宗喀巴的母亲生了6个孩子,宗喀巴排行老四。宗喀巴出家后,这个家庭在苏尔吉村就剩下他的母亲和姐姐了。据传现在苏尔吉村的先人们就是宗喀巴姐姐的后代。

据说,宗喀巴是父母亲在“冬窝子”,也就是塔尔寺附近放牧时诞生的。宗喀巴出生时,因无人接生,就从今湟中县鲁沙尔镇红崖沟村一带请了一位接生婆。宗喀巴出生后不久,香萨阿曲便将包裹过婴儿的一件衣服拿到苏尔吉留作纪念。宗喀巴后随母亲在苏尔吉住了两年多。宗喀巴圆寂后,苏姓家族人从西藏请回大师生前衣物、用品、经卷等物以及大师绘像,在本村修建佛堂3间供奉,称为“苏尔吉佛堂”或“苏家佛堂”,藏语称为“曲布藏”。塔尔寺建成后,又在原有佛堂基础上由塔尔寺出资扩建苏家佛堂。原有建筑为一四合院,佛堂系二层木楼,上下各3间,座西向东,与塔尔寺相望,内供塔尔寺所赠宗喀巴大师鎏金小铜像1尊,另建有厢房10余间。该佛堂由于与宗喀巴大师的上述特殊关系,历史上颇负盛名,不仅是当地信教群众的重要活动场所,其他地方的朝拜者也络绎不绝。

后来在珍藏孩子衣服的地方修建了纪念佛堂。如今,在苏尔吉香萨阿曲住过的地方仍有一座两层的木楼,把这个院子叫“曲布藏”。佛堂先后维修了两次,一次是在解放前,一次是1990年在塔尔寺管委会及各位活佛的资助下重新进行修缮,并赠送了一座两米多高的小银塔。宗喀巴在塔尔寺出生后随母亲在苏尔吉住了两年多,后学经到夏琼寺(化隆)。

据苏尔吉的老人们回忆,原来佛堂里供奉着一尊塔尔寺所献的宗喀巴大师鎏金佛像,佛像的每一关节处都装饰着珍珠玛瑙,佛指都用金叶镶嵌;一座约两米高的十分精制的木雕如意银塔,塔上镶满翡翠玛瑙,还有一幅从西藏带来的宗喀巴送给姐姐的自画像,大师穿过的衣物、靴子、用过的碗,一份藏、汉两种文字的文书,一口铸铁钟以及诵经用的鐃钹、鼓等。

1949年以前,苏尔吉村的两个家族“苏家”和“罗家”因土地纠纷到西宁衙门打官司。罗家有一位“保长”做后台,势力较强,苏家只好央求塔尔寺的佛爷帮忙。最后,苏家赢了这场官司,为了答谢塔尔寺,苏家便将佛堂里供奉的宗喀巴大师自画像和三只碗赠给塔尔寺。

在今塔尔寺所在地鲁沙尔镇南约3公里的地方,有一个红崖沟村,上述民间传说中为宗喀巴接生的人就是这个村子请来的。为此,这个普通的村落便与宗喀巴结下了不解之缘。据红崖沟村的老人们讲,原塔尔寺所在地当时是红崖沟所在部落的地盘,因有了为宗喀巴接生这段因缘,后来宗喀巴母亲建塔修寺时,红崖沟所在部落的头人便自愿将自己的领地出让给塔尔寺。当时红崖沟所在部落的头人为百户,后随时光变迁即以“白”姓为姓,所以至今红崖沟白姓人家也自称为宗喀巴的娘家人。塔尔寺建成后,大金瓦殿的一把钥匙就由红崖沟白家所管。后又在红崖沟村修了一座属寺,叫红崖沟寺。红崖沟寺北靠塔尔寺,与塔尔寺仅一山之隔。历史上,塔尔寺每年举行的晒大佛、转金佛、祈愿法会时一直由红崖沟村信众参与承办,在佛事活动中所收布施大部分归红崖沟寺所有。另外还保留着每年塔尔寺从总寺布施中分出三十二份给红崖沟村、红崖沟村寺的门僧在塔尔寺大经堂领取布施的惯例。每年农历二月初二,塔尔寺密宗学院的全体僧人要到红崖沟寺院诵经祈祷。这种习俗一直延续下来。

在宗喀巴父母身上,充分体现了藏民族善良、勇敢、直率的民族性格,也折射出当时宗喀地区宗教氛围的浓厚。父亲鲁本格“是一位心性仁慈,智慧超群,深心敬仰佛法僧的三宝弟子”,“他每天持诵文殊真实名经,从无间断,对于文殊菩萨的种种殊胜功德,也有无比的信敬与欢喜心”^{[1]17}。由于他虔心向佛,深谙因果之道,又具有足够的勇气和毅力,宗喀巴的信徒们相信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就了

信财、戒财、舍财、闻财、有愧财、知惭财和慧财等七种功德财,成为令人景仰的大德。母亲香萨阿曲更是典型的藏族贤妻良母和声誉圆满、懿德昭著的佛门弟子。“她心地善良,和蔼贤淑,没有嫉妒怪吝的心,也没有女人一切的过失。对于无依无靠的人,自然会生出无量的悲愍心,每次总是尽最大的力量去安慰他们,救助他们。她每天不断的礼佛,持诵观音菩萨的六字大明咒,积极摄集身、口、意三种清净善业。”^[1]¹⁸按照佛教的说法,这样“具大善根”的家庭,已具足了诞生像宗喀巴这样伟大人物的条件。

参考文献:

- [1]修慧法师. 宗喀巴大师应化因缘集[M]. 上海:上海佛学书局,2010. 16.
- [2]祁永柏. 宗喀巴落发皈依的峡峻寺[J]. 青海民族研究,1991(1):44.
- [3]崔永红,等. 青海通史[M].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199.
- [4]巴明旺. 宗喀十三族考[J]. 青海藏族,2005(1).
- [5]兰州府志:卷二[M].
- [6]宋史·志第四十·地理三[M].
- [7]符拉基米尔佐夫. 蒙古社会制度史[M]. 刘荣焄,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262.
- [8]王尧,褚俊杰. 宗喀巴思想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2.
- [9]法王周加巷. 至尊宗喀巴大师传[M]. 郭和卿,译.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69.
- [10]古伯察. 鞑靼西藏旅行记[M]. 耿昇,译.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387-388.

(上接第12页)

- [9]克主杰. 密续部总建立广释[M]. 谈锡永,译. 香港:密乘佛学会、博益出版集团有限公司,1996:80-94.
- [10]伊萨克. 族群[M]. 邓伯宸,译. 台北:立续文化有限事业公司,221.
- [11]莫阿卡宁. 荣格心理学与西藏佛教——东西方精神的对话[M]. 江亦丽,罗照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79.
- [12]西南和平法会特刊,1931年4月,《附载》,第10-11页.
- [13]欢迎多杰格西志盛[J]. 四川佛教月刊,1931(2):12.
- [14]和平法会近闻[J]. 四川佛教月刊,1931(2):14-15.
- [15]西南和平法会开坛纪盛[J]. 四川佛教月刊,1931(3):9.
- [16]和平法会要闻[J]. 四川佛教月刊,1931(3):10.
- [17]多杰尊者过沪传法纪略[J]. 佛学半月刊,1932(69):9.
- [18]多尊者在世界佛教居士林传法志盛[J]. 威音,1934(55):《国内之部》.
- [19]多杰谢若. 多杰觉拔尊者香港传法记[J]. 佛学半月刊,1934(77):9.
- [20]觉拔上师在京传法讲经[J]. 佛学半月刊,1934(78):55.
- [21]布洛菲尔德. 西藏佛教密宗[M]. 耿昇,译.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109.
- [22]詹姆斯. 宗教经验种种[M]. 尚新建,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147.
- [23]西藏喇嘛修法祈祷[J]. 海潮音,1937,18(11):44.
- [24]净密. 重编密传弥陀长寿合修法序[J]. 佛学半月刊,1934(75):9.
- [25]绿度母咒最近灵感纪实及饶益众生浅说[J]. 光明月刊,1937,1(8):18.